

民族研究论集

(一)

杨福祥 张维生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3

前 言

辽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区，他们在这块肥壤沃土上，共同开拓、耕耘、繁衍、生长，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目前在辽宁居住的共有44个民族，其中有满、蒙古、朝鲜、回、锡伯族等少数民族43个，人口616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5.6%。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辽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路线与各项方针政策，在为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辽宁现有10个民族自治县（其中有8个满族自治县、2个蒙族自治县）、5个少数民族聚居区、144个民族乡镇。因此，如何结合辽宁民族问题的实际，加强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的研究，对振兴辽宁、发展辽宁，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辽宁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各少数民族现实状况着手进行较为系统地整理研究，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多次召开了有国内学者参加的满族文学史编写会议、北方七省区满族古籍整理出版协调会议等学术会议。为了适应当时民族工作与民族理论研究的需要，1982年8月建立了东北第一个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专门机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从而把辽宁的民族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现有满族人口近 500 万，占全国满族人口的半数以上。依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成立后就确定：“以辽宁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满族研究为重点的建所方针”。并在一些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先后共发表论文 300 余篇、专著 10 余种，参加了 5 项全国重点研究课题编写工作，另有 3 项列为省重点研究课题。这些成果无疑对辽宁省的民族研究，尤其是在满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诚然，在这些成果当中，凝结着我所老一代专家学者的心血，同时也深刻着中青年科学工作者的辛勤笔耕。

为了纪念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我们出版了这本《论集》。书中共选录我所科研人员（包括离退休和已调离人员）已发或未发的部分论文篇。本《论集》，虽不算什么皇皇巨著，但它至少也为民族研究的百花园里增加了几束朴实无华的花，并使之加色添采！《论集》也犹如一面镜子，如果它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建所十年的成长史，从而能收到“知兴衰得失，正衣冠”之效，我们也就感到十分的欣慰了！

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凡此种种，都将给新时期的民族工作与民族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引出许多新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理论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让我们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实现辽宁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民族工作与民族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奋进、探索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新的挑战!

编者

民族研究论集

(一)

目 录

前 言

要为金史学和女真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	金启霖 (1)
女真文字研究概况	金启霖 (4)
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初探	何溥澄 (20)
清代前期满族的发展变化	何溥澄 (41)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	关克笑 (62)
关于满族的文化和语言	乌拉熙春 (96)
浅论驻防八旗	马协弟 (108)
清代满城考	马协弟 (123)
八旗制度下的满族	马协弟 (132)
清末营口开埠及历史地位	魏福祥 (147)
营口炉银的兴衰	魏福祥 (159)
张作霖与末代皇帝溥仪	魏福祥 (168)
论清代满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张佳生 (181)
昭槁与《啸亭杂录》	张佳生 (192)
论清代满族词坛及词作特色	张佳生 (207)
满族歌舞	李 德 (213)

满族绘画探略.....	李 德 (232)
浅谈明清时期辽宁蒙古族的经济.....	白凤岐 (247)
概述辽宁蒙古族的源与流.....	白凤岐 (264)
试论明代广宁的马市.....	李云霞 (287)
试论古代朝鲜语的助词.....	金喜成 (298)
试论古代朝鲜的“吏读”.....	金喜成 (304)
论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	于永祥、何晓芳 (309)
试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发展趋势.....	何晓芳 (320)
论现代资本主义多元文化民族政策的实质	何晓芳 (333)

要为金史学和女真学的研究 打开一个新局面

——在《大金得胜陀颂》建碑 80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金启琮

纪念《大金得胜陀颂》建碑 800 周年的集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会。它是研究金史学和女真学，在白城地区可贵的开端。听说白城地区有的单位领导同志大力支持，促成召开这样一个会，值得我们敬意。学术会议能开与否，学术研究有无成果，除去是否具备这样人才之外，主要关键问题在于领导是否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纪念会开得好，我愿意在会上提出一些有关研究工作的建议。

我们国家有许多人才，吉林省人才荟萃，白城地区人才济济，可以投一部分力量放在金史学和女真学的研究上。因为这是我们这一地区的乡土史。我们都熟悉的《歌唱祖国》这一首歌中就有“我们爱祖国，我们爱家乡”的句子。热爱家乡是热爱祖国的思想的基础。但是热爱家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研究家乡，了解家乡。所以我说这个会开得很有意义，就是在于本地同志热爱家乡遗迹，纪念《大金得胜陀颂》建碑 800 周年。

“得胜陀”在金代，那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后来就荒废了。我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在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开这个会。我们开会不是开完就完了，而是在这个会上让大家有所得，有信心，为中国金代的历史文化不断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先说说“金史学”：开展金史的研究，拿出有分量的成果，只是近一二年的事。过去金史除去个别老专家有资料性专著、论文

外，一般都是宋辽金一揽子研究，极不细致。而且没有立足于金史，而是立足于宋史来研究的。立足于宋史，金朝就成为侵略者，大事就只有“靖康之役”等等侵略战争。金的内部情况，金的文化便都不去注意，好像宋金两个政权的关系、汉真两个民族的关系，只是战争关系，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要研究金史应立足于金，在白城地区研究金史要立足于白城地区，也就是作为白城地区乡土史来研究才有意义。研究的重点不只是政治、经济，应当侧重文化。金的哪些文化贡献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例如：“土炕”、“热炕”算不算？热炕已成为整个华北农村冬季的取暖方法。其次如烧饭（后演变为“烧活”）、供佛的“楼子”（女真文做“”）昔日也曾遍及华北。姓氏更是这样，听说福建台湾还有姓“粘”的，是“粘罕”的后裔。研究战争易产生民族隔阂，研究文化交流，易增进民族团结。我们应以研究后者为主，前途是大有可为的，可否做为本地区今后研究金史的一个重点。

其次，谈谈女真学的研究，《大金得胜陀颂》碑，一面是汉文，一面是女真文。我们这里对汉字碑文写了不少有分量的著作，对女真文还没有触及。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是女真学的核心之一。现在有人把女真字与契丹字、西夏字并列为古文字，其实女真字虽借鉴于契丹字，但女真语与契丹语并非一个语族。以我们这里来论，不必研究契丹、西夏，但应研究女真。

有人说女真字已能解读，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要研究还是突破契丹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一个人，一个地区的研究工作，必须结合本身、本地区才有意义。比如，我是满族，研究女真就较有意义。白城地区在历史上是金朝的内地，是《大金得胜陀颂》碑的所在地，自然以研究女真文较有意义。不只如此，将来还有可能在地下有新的发现，我们不能不有这种远见。迄今中外对女真文字的研究，按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1、最初是发现资料

2、其次是释读和研究资料

3、现在是研究文字结构、语法、语音

越来越深入。对这一学科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研究女真文字要和《金史》的研究,相互配合,必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我的这些建议,不但贡献给白城地区,同时也贡献给整个东北三省。祝愿到会同志,为金史学和女真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是我深为期望的事。

祝大会胜利!

祝到会同志们身体健康!

祝全体同志在金史学和女真学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1985年8月于扶余县

女真文字研究概况

金启琮

女真文字是中国古文字的一种,创制于20世纪,在国内部分地区推行、使用达5个世纪之久。

女真文字是金太祖阿骨打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以契丹、汉字为基础,加、减或变化其笔划制成的。

有清一代讳言女真,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清太宗除将国号“金”改为“清”之外,还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从此200年来研究女真成为禁区,女真文字也不例外。直到清朝中叶文网渐弛,女真文字才为学者所注意。今天中外研究女真文字的学者日多,女真文字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学问。

一、女真文字的源流

任何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当他们创造本民族的文字时,必然受到文化较高的相邻民族文字的影响。他们或者直接采用相邻民族的文字,或者经过某种程度的改造后用作书写本民族语言的符号。中国的契丹、党项二族就是参考汉字的笔划结构,创造了契丹和西夏字的。

与女真有关的契丹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契丹大字造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年),现存石刻有1954年在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村出土的《萧孝忠墓志》(简称“萧墓文字”)。契丹小字造于辽太祖天赞三年(公元924年),现存石刻有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庆陵发现的辽代《庆陵哀册》(简称“庆陵文字”)。前者为单体字,为意字。后者为叠写字,为音字。

女真兴起时，与契丹接壤，受契丹文化影响较深。女真文字是在契丹字直接影响和汉字间接影响之下创造出来的。所以《金史》记载完颜希尹造字的方法是“依仿契丹字制女真字”或“依仿汉字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总体来说，女真文字是来源于契丹和汉字的。女真造字的时候，是以契丹字和汉字为基础，加、减笔划，或取其音，或取其义制成的。

据《金史》记载，女真文字也有大、小的区别。大字为完颜希尹所制，于金太祖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颁行；小字创于熙宗，于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颁行，皇统五年（公元1145年）初用。现传世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其形制与锦西“萧墓契丹文字”相同，应当是大字。至于小字，日本《吾妻镜》所载“银筒铭”，已有苏联塞金古城出土的符牌可证明，其第一字为“花押”，其余女真字乃“国信”（直译“国之诚”）之意。又《弁州山人四部稿》及方于鲁《方氏黑谱》中女真文“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八字，其形制与契丹小字相类，或为女真小字抑未可知。但也有人认为今天传世的女真文字就是小字。

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现有不同的看法，随着研究逐步深入和出土有力物证，将来是可以澄清的。

二、女真文字的发现

现已发现的女真文金石刻、墨书题记、《女真译语》等资料，原来早就存在，有的甚至在宋、明人著作中已有著录，不过长久以来不被人注意而已。直到19世纪因为“女真学”的抬头，重新又被找寻出来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发现”，实际上是“再发现”。现在我们先把女真文金石刻、墨书、题记资料，按发现的顺序介绍于下。然后再按解读的顺序，介绍这些资料迄今解读所达到的程度。

在上述资料中首要是金石刻的发现,其次是解读女真文字所用的工具书——《女真译语》的发现。

女真文金石刻中占重要地位的又是石刻——碑和摩崖。因为石刻字数较多,有的且有汉文对照,易于对照解读。在石刻中首先被发现的是河南开封的《女真进士题名碑》(以下简称《进士碑》)。这个碑本早已著录在宋·周密《癸辛杂识》、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和清·王昶《金石萃编》中。但直到1829年(道光九年),才由刘师陆和麟庆找到了它。1885年(光绪十一年)曹廷杰奉命到我国东北和西伯利亚进行调查,先后发现了在吉林省扶余县拉林河西岸七里的《大金得胜陀颂碑》(以下简称《得胜陀碑》)和明代在黑龙江入海口特林地方立的《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以下简称《永宁寺碑》)。《得胜陀碑》在曹氏发现前也有著录,见于1823年(道光三年)萨英额的著作《吉林外记》中。除以上三碑外,杨同桂于清末发现吉林省海龙县的《海龙女真国书摩崖》,录文后收入《沈故》中。《朝鲜北青郡女真国书摩崖》(简称《北青碑》)1191年为日本鸟居龙藏所发现。《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简称《庆源碑》),1918年为日本人所发现,后移汉城博物馆,以上二碑碑影均收入日本朝鲜总督府1919年编的《朝鲜金石综览》上卷中。《奥屯良弼钱饮碑》为上虞罗氏家藏,今归中国历史博物馆。《奥屯舜卿诗碑》解放后于山东发现,拓片现存北京文物出版社。吉林省舒兰县小城子公社《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碣》左侧有女真文21字,1980年为吉林省考古工作队发现。

至于印、镜铭文,字数甚少,价值远不能和碑碣、摩崖相比。自女真文字学兴,考古界始注意女真文印。1916年于吉林省和龙县发现了《可陈山谋克印》,继而1933年罗福成《女真译语正编》发表了《移改达葛河谋克印》,解放后发现了《夹浑山谋克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河头胡论河谋克印》,《和拙海蛮谋克印》(均天津博物馆藏),迄今为止,计共有五方。铜镜则有《咸平府谋克官造镜》,《叩

畏猛安铜镜》、《绶带纹铜镜》等。

墨书题记，则有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部白塔上女真字题壁、科右中旗都尔基公社毛都营子屯女真墨书题记、科右前旗乌兰茂都公社墨书题记等。而最可宝贵的是 1973 年陕西省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残页。

以上是女真文字金石刻及墨书题记、文书等的发现。

但以上这些资料的发现，还解决不了解读的问题。欲想进行解读工作，那只有发现工具书才有可能。1896 年德国葛鲁贝(W. Grube)以《华夷译语》中的《女真译语》为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写出了《女真语言文字考》(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 en)一书，学术界对《女真译语》才开始注意。

明朝编的《华夷译语》原为处理属部、属国进贡、封官等公文之用。前后编辑了三次：最初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编的《华夷译语》只有蒙古字的《鞑靼译语》一种。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设立“四夷馆”。这时明朝版图已扩大，遂分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隶翰林院，取举人、监生年少者入翰林院飞“夷”字，称为译字生，以通事为教师。各馆都编有《译语》以为译字生学习和翻译往来公文之用。各馆《译语》大体上都分为“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专辑语汇，除以汉义对照外，并以汉字注写读音。“来文”则移录当时进贡表文，“夷”汉字对照。其中《女真馆译语》(简称《女真译语》)，便成为解读女真文各种资料的工具书。其后，明朝会同馆又编了一种《华夷译语》，只有语汇，没有来文；语汇又只有汉字写音，没有原文。编辑目的是为通事口译所用。其中也有《女真译语》，对研究女真文字也有参考作用。

自葛鲁贝公布柏林图书馆藏《华夷译语》中的《女真译语》以后，日本对上述三种《华夷译语》便进行研究，分别命名为甲种《华夷译语》、乙种《华夷译语》和丙种《华夷译语》。直到 1944 年罗继祖在《女真语研究资料》(《国学丛刊》第 14 期)一文中，始用洪武本

《译语》、永乐本《译语》和茅伯符本《译语》等中国自己的称法。1964年金光平、金启琮在《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中沿用罗氏称法，只把茅伯符本《译语》改称会同馆《译语》（因有人指出《两种译语》非茅氏所编）。

以上是研究女真文字的工具书的发现。有了工具书，对于女真文金石刻、墨书题记等的解读，才有了可能。

三、女真文字的解读和研究

女真文字的解读和研究，已有150年的历史。我们按时间顺序，把解读和研究的成果介绍于下。

第一个时期（公元1829—1923年）

这个时期是从刘师陆开始注意《进士碑》到1923年罗福成研究考证《进士碑》以前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是整理资料 and 介绍资料。

1829年刘师陆研究《进士碑》，写出了《女真字碑考》和《女真字碑续考》二文，据云当时“索者纷纷”，颇有影响。刘氏实为近世研究女真文石刻的开创人，唯因当时限于资料条件，加之《进士碑》碑阳汉文已被磨去，他仅对照文献记载，考出《进士碑》大体内容为金代“女真进士题名”。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应予肯定。唯对碑文字误以陕西乾陵《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之契丹字为女真大字，遂定《进士碑》为女真小字。他的朋友麟庆又在《鸿雪图记》中“宴台访碑”一段文字里代为宣扬，致影响中外注意女真文字的学者杨同桂、拉库伯里、葛鲁贝、白鸟库吉等人均沿此说。实则此说与今日主张传世女真文字为女真小字的见解，并不相同，而是一种误解。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里亚写有《宴台碑考》（Examen de la stèle de Yentai），7年之后，拉库伯里所著《女真考》（The Djurtchen of Manchuria, their Nam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

也涉及到《进士碑》，但因为他们没有见到原碑和拓片，只利用了清代王昶《金石萃编》上的录文，其结论不足为据。

其后，1880—1884年（清光绪六年到十年）间，海龙通判杨文圃之子杨同桂访得吉林省海龙县杨树河山（后讹为杨木林山、杨树林山）女真字摩崖石刻，写有《女真小字碑》一篇介绍文章，收在所著《沈故》中。

1885—1887年（光绪十一年到十三年），候选州判曹廷杰奉命勘察东北和西伯利亚，又发现了吉林省扶余县石碑崴子地方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和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特林地方的《永宁寺碑》，写了《得胜陀碑说》、《得胜陀瘞碑记》及《特林碑说》等简短的介绍文章，并拓碑存档。后来内藤虎次郎（湖南）的拓本，即得自曹氏。

1896年，德国葛鲁贝在利用我国流出的《华夷译语》中的《女真译语》（因曾藏于柏林图书馆，后称此本为“柏林本”《女真译语》）写了《女真语言文字考》一书，这本专著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女真文字的开端。葛氏把《女真译语》中的“杂字”拆开，按单字的笔划排列，共得698字，逐字定音、释文。又将“来文”二十通中的女真字“来文”，进行转写和德译。这样便把《女真译语》整理成一部科学的工具书，直到今天仍然受到重视。葛氏在整理女真文字中有一些错误，不过与总的业绩相比，应该说是白璧微瑕。……

1898年白鸟库吉发表了《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这篇文章除了另举证据证明《郎君行记》为女真大字外，对《进士碑》没作什么说明，只是介绍一些资料而已。1910年，日本桑原隲藏在《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书》中详细记录他过开封时调查《进士碑》的经过。但除介绍情况外，只说他同意刘师陆的看法：《进士碑》是女真小字。对《郎君行记》也只含混地表示是女真字而已。

1911年，日本鸟居龙藏朝鲜镜南道北青郡发现了一处女真字摩崖，即后来所称的《北青碑》。1913年他又到中国吉林海龙看到《海龙摩崖》。他的《女真文之碑》一文中指出这两处摩崖的文字

都是女真小字。至于内容却说“留待他日考证”。1918年，在朝鲜咸镜道庆源郡发现了方柱形的《庆源碑》。因为朝鲜有女真碑的发现，小仓进平于1917年5月发表了《在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一文，介绍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朝学习女真语的情况。1919年把上述两碑编入《朝鲜金石总览》上卷中，所附碑影把《庆源碑》四面碑文次序弄错了。这个错误直到1960年才为金光平所纠正。

第二个时期(公元1924年—1948年)

这个时期是从利用《女真译语》正式解读《进士碑》开始，展开了对前一时期中发现出来的各种石刻的解读。同时，对《女真译语》及有关资料的研究也大有进展。

罗福成于1923年写了《宴台金源国书碑跋》，1926年又写了《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前者考出女真若干单词，后者已渐至解释碑文。但碑文只能说是初释，碑中文意还未能逐句释出。1932年毛汶《金源国书碑跋》一文，在罗氏研究基础上利用满文释女真字义，据说：“可识之字，不过四五十耳”，进展不大。1937年王静如《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初释》发表，较罗、毛二氏释文大大前进一步，碑文梗概大致可知，只有若干难点，尚未解决。

罗福成在解读《进士碑》同时，1929年又解读了《海龙摩崖》，在题为《女真国书碑跋尾》一文指出碑文里有“收国二年五月五日”字样。同年罗氏又发表了《女真国书考释》，所录碑文较杨同桂多对了25字。1931年周肇祥《辽宁新发现金国书摩崖》误以“收国二年五月五日”为刻碑年月，指出“收国二年尚无女真字，罗君所译恐未确”，这纯由碑文未能全释而产生的误解。

1930年，稻叶岩吉对《北青碑》做了释读，写了《北青城串山城女真摩崖考释》，认为碑文内容为“元末女真人立石观赏题名的记事”。1943年安马弥一郎在《高丽北青城串山摩崖碑》一文中不同意稻叶氏的结论，重新译释，不过，只译出“高丽国”及“黄寅[虎]年七月口日”等字样，全碑文意仍未明了。

日本学者早闻《大金得胜陀颂》之名，东北沦陷后便多方寻找。1931年日须佐嘉祐找到此碑，在《青丘学报》十四号中做了报道。1932年写了《金得胜陀碑跋》指出“大定之碑史未之载，可补史阙”。1933年须佐将寻碑经过写了《得胜陀碑行记》，并将所摄碑影放大，编成《大金得胜陀颂写真贴》。同一年，园田一龟在《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一文中指出《吉林外记》等书记载碑阴女真字12行之误，应为本文17行，颂辞11行；题名、年号在外，并指出此碑为研究女真语的贵重资料。1937年田村实造写成《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为该碑碑文释读之始。翌年，安马弥一郎以《读“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为题，撰文指出田村氏释文错误有十余处，并在1943年自作释读，与田村互有发明（载入《女真文金石志稿》一书中）。

1937年，罗福成初次解读《永宁寺碑》，著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女真国书图释》，毛笔亲书，释出全碑文义半数左右。至此前一时期所发现的六处女真字碑，除《庆源碑》外，都已有了解读文章。

在中、日两国专家解读上述各碑的同时，又发现了两个新碑：一是1934年岛田好撰文介绍的《女真文奥屯良弼钱饮碑》，另一个是同年9月山下泰藏《关于新女真国书碑》一文中说在距海龙县西南140里柳河县半截山顶，又发现女真、汉文对照的摩崖一处。即所谓“半截山碑”。1935年宗孟撰文《女真文刻石新发现》，内容主要是山下泰藏文章的汉译文。所谓“半截山摩崖”女真、汉文对照，汉字云“大金太祖大破辽军于节山息马立石”，字多漫漶。女真字迹尤甚。

在这个时期，除了竞相解读上一时期再发现之碑以外，还作了下列三件工作。

一是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1933年，日本渡边薰太郎发表了专著《女真馆来文通解》。这部书把柏林本《女真译语》和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东洋文库本《女真译语》中的“来文”合计四十通（柏林本来文二十通，东洋文库本十九通，编者又补入内藤湖南